

## 俄语曾扩大了我的诗歌视野

□ 孙绳武

我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考入前国立北平大学商学系的。为什么进商学系?这是因为我在中学时的朋友王家骥那时已是这个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他告诉我系里的课程有经济理论和技术课,但外语是俄文,为的是培养一部分边贸需要的人才。对经济课程我没有什么好恶的想法,对俄语却有些兴趣。因为翻译工作的效用已开始受到社会的注意,文学翻译也是如此。尤其是我从少年时起就喜欢诗歌,读过少数译过来的外国诗歌,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也在这方面得到尝试的机会。这个学校当时是由北京的国立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的法商、农、医、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天津的北泽工学院联合组成的,叫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入学后先在西安上课,但不久因战争形势变化,全校迁移到了陕南的汉中、城固、泽县一带。几年匆匆过去,我并没有试着译诗,毕业时从一本俄文经济理论书中译了一章,交上去算是毕业论文,就离开陕西去四川了。商学系毕业的学生大部分进了税务局或银行工作;我很幸运,由于一位老师余杭的介绍,进入当时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工作,从此直接接触了俄苏文学,但更有利的是我有了通过工作与自学提高俄语的环境。

苏联这时正在全民奋起,进行猛烈的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争,各民族的诗人也纷纷以他们的作品和声音鼓舞人民保卫自己的祖国。这大大地扩展了我对苏联诗歌创作的认识。

这时战争虽已爆发,但苏联文化组织有时还送些新的文艺书刊给中苏文协。有一天,在寄来的书中我发现有一本诗集,是从白俄罗斯文译成俄文的。看了序文我才知道这是白俄罗斯民族大诗人扬卡·库巴拉的诗选。他生于1882年,是一

个佃农的儿子,当过教师、文书、伙计、工人、编辑。1905年的俄国革命影响了他的思想和生活道路,认为诗歌应当反映农民的境况和希望。他先后写出不少诗作,高尔基很早说过,他的《是谁在那里走过》一诗堪称白俄罗斯人的国歌。他的一篇叙事诗《古墓》描写地主阶级对穷苦正直的老琴手的压制和迫害,篇幅虽然不长,却非常动人有力。对白俄罗斯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诗作中也有许多美好的描写,特别是对沉重劳作中的妇女。那时我刚刚在陕南的农村中住了几年,我熟悉那里的农民的生活苦恼,更多的是他们的善良和朴实,很怀念那里的一切。这本诗集正符合我当时的情怀,于是便在曹靖华、戈宝权先生的支持下选择几十首编成一册,并用诗中常常出现在白俄罗斯的民间乐器“芦笛”作为书名。戈宝权先生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文。终于于1946年,在上海由陆萼生先生的文光书店出版。陆萼生先生是一位学徒出身的出版工作者,认真而热情,一直在上海出版界工作到老年,我终生不忘他在青年时期对我的帮助。

但是,我那时对外国诗歌的了解还很有限,就是在这本库巴拉诗选的俄译本序言中,译者说,库巴拉可以和著名诗人彭斯相比,我读了还不知彭斯是何人。几年后袁小柏先生出版了《我的心在高原》,我才知道彭斯是文学史上闻名的苏格兰优秀的农民诗人。

195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从俄文报刊上读到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一些诗。他是一个土耳其贵族的儿子,进过海军学校,思想进步,因参加反帝斗争被除名。他曾流亡苏联一段时间,认识了马雅可夫斯基。22岁回国后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坐了多年的牢,1950年后重返苏联。他从十几岁起开始写诗,作品很多,主要宣传反帝的革命思想,呼吁世界工人的团结和农民争取摆脱压迫、获得自由。他在狱中写过一首《我的心不在这里》,表示他的心一半在中国,同着中国的战士并肩作战,充分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非常真挚动人。

1952年他应邀来中国访问,到了北京、上海等处。不知是谁建议出版一本他的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楼适夷同志就请青年编辑张奇同志去找我。我建议这本诗集可以包括三部分译稿:在中国报刊上已发表的一些译文,如沙可夫译的几篇;我在上海译出而还未发表过的一些译稿;肖三先生译的希克梅特来访后新写的关于北京的一些诗(例如关于颐和园石船的诗)。适夷同志同意这个计划,于是我就把整个集子编好,由张奇同志作责任编辑,在当年出版。肖三先生这时期已不大译诗,但很快把希克梅特到中国后写的几首诗热心译出,我想是因为他们30年代都在苏联,有过旧时的友谊的缘故。

希克梅特晚年诗作很少,倒是写了几个剧本,可惜没有太大影响。

我所译的第三位外国诗人是伊拉克的诗人白雅帖。他于1926年生于巴格达一个商人家庭,起先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1954年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逮捕,后又被流放,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60年代初是原殖民地独立解放的高潮时期,虽然在我国已经有一批学阿拉伯文的人,但从事翻译的人还不多,我们常为此感到遗憾。有一次从苏联订购来了一本白雅帖的诗的俄文译本《流放之歌》,看了感到很亲切流畅。我建议那时在出版社负责主持亚非文学工作的卢永同志,我们共同把它译为中文尽快出版,因为亚非解放运动受到各国注意,而伊拉克的新文学作品却不易找到。即使这本诗集也不是莫斯科大出版社出的,是我们从苏联一个亚洲共和国的书目上发现订购的,印刷也比较简约。卢永同志同意,我们各译诗集的一半,早些翻译完,出版后稿费完全捐献支持亚非解放运动。我们没有见过白雅帖本人,有一两位阿文学者在国外出席作家会议时曾结识了他,把中国出版了他的诗集的事对他说了,他很满意。他出过好几本诗集,一直没能重回祖国。这次伊拉克陷入战争后,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过他在伊拉克文学史上仍占有显著的地位,有的书中说他是伊拉克现代文学中存在主义的代表。

1960年代后期,苏联的老一代诗人渐渐凋谢,中国介绍的也少了些。这时有一位立陶宛诗人梅热拉伊蒂斯突然获得了全苏最重要的文学奖“列宁奖”。其实也并不突然,因为他生于1919年,二次大战时起当过随军记者,从青年时代起,发表过不少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这时任立陶宛作家协会主席。他获奖的作品是诗集《人》,一本薄薄的小书,统共也只有大约二十篇抒情诗。有人说他受了比利时大诗人凡哈伦的影响。凡哈伦的诗早期在我国只有诗人艾青译过几篇,即《城市》、《椰林》,甚得好评。也许是凡哈伦的诗中的散文化色彩对梅热拉伊蒂斯有些影响。我那时已准备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就利用行前闲暇的时间翻译出来,留给了编辑审阅。

《人》的主要思想内容是:赞美加加林这一代征服空间的英雄,实现了人类前未能完成的伟大事业,具有苏维埃时代征空者的优异的素质和人性的感情。此外,诗人还用相当的篇幅表述了受难者在法西斯的集中营中忍受酷刑的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这后一部分应该说是诗集中写得最有力动人,也是散文化手法运用最为出色的。“文革”后这本小书曾蒙高莽同志和编辑同志的支持,重新修改了一遍,第二次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选译的这些都是“小国家”的,或者不太为人广泛注意的国家的文学。除了我个人对这些作品的爱好,也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有一些人很重视小国文学的表现和发展,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就是我国在这

方面的代表。我可能也是受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还有孙用先生,他在言传身教上给我的帮助至多。当然,在 20 世纪这个复杂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这些国家的文学也吸收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另一方面,我翻译这些作品都是根据俄文译本转译为中文的,这也因为我只有这一点能力。前辈们曾充分利用上半世纪不断出现的世界语的译本介绍各国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但世界语的高潮这时似乎已经过去了。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更加注意介绍外国优秀作品,尤其是其所倡导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鼓舞和吸引了各国各地的有相同认识的作家,把他们的作品译为俄文,为我这样的译者提供了方便。在当时,从这种转译中我确实感到不少快乐。但随着我国的外语教学界愈来愈发达、广泛,能从事直接翻译的人日益增多,我也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转译在根本上并不是保证译文高质量的好方法。